

从经学到文学

——明代《诗经》学史论

刘毓庆 / 著



商务印书馆

从经学到文学

——明代《诗经》学史论

刘毓庆 著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刘毓庆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ISBN 7-100-03281-4

I. 从... II. 刘... III. 诗经—文学研究—中国—
明代 IV. I 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00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ÓNG JĪNG XUE DÀO WÉN XUÉ

从经学到文学

——明代《诗经》学史论

刘毓庆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281-4/K·695

2001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5

定价:24.00元

献 给 母 校

山西大学百年华诞

曹道衡先生序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往往有着各自不同的文风与学风,不但如此,要是我们具体地考察一下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不论哪一个时代都存在不同的文艺和学术流派。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代文风或一代学风,那不过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一个流派,并不是说与此同时就不存在其他流派。

对待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的文风和学风,往往需要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不宜笼统加以肯定或否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在文风方面似乎早有认识,如曹丕之批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江淹之反对“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都可谓通达之论。在学风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然而历来的文人和学者真能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并不很多,各种各样的门户之见往往数见不鲜。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因为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虽常有所长,亦难免有所短,由此而来的是对某些方面的特别重视和爱好,对另一方面却有所忽视,于是执此非彼,党同伐异的现象就此便产生了。平心而论,由于人们的才能各有不同,因此各自发挥其所长,而对其所短采取藏拙的态度,应该是勿需指责的,但以其所长去轻人所短就不对了。

造成人们对某一时代或某一学派的评价有失公允的又一原因也许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这种偏见的形成,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即以刘毓庆先生本书所论到的明代《诗经》学而论,就是

2 序

这样。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人们对元明二代的学术往往采取贬抑的态度,关于这二代学风的得失,我们姑置不论,但把三四百年间的学术成果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终归是不妥当的。尽管不少年来,许多人都存在过这种看法。我本人也是这样,推原其故,除了受前人影响——例如刘毓庆先生提到的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以外,大抵和初次接触古籍时入手的门径有关。回顾我在解放前夕,刚要学习古代文史典籍之初,想要找一本目录学书籍作为入门的向导,而在这些书中,最为流行的大约要算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部书确实是一部好书,但其缺点往往只谈“汉学”,不谈“宋学”,特别是介绍“经部”著作时,常声明对宋元明人著作从略。当时出版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即以有关《诗经》的典籍而论,要找一部清人著作如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或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都比较容易。铅印的、石印的都有,价格亦不贵。至于宋元明人著作则除朱熹的《诗集传》外,一般都不易得,即使有,亦非一般学生能问津,于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重汉轻宋的偏见,对元明人的著作也很少注意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由于接触到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和王夫之的《诗经稗疏》,也曾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考证学是否在明代已开其端?因当时工作较忙,并未作任何探索。后来有一次我去燕东园拜谒先师游泽承先生,游先生给我讲了有关历代《诗经》研究的典籍,每种著作都详论其版本及优缺点,对我有极大的震动。我很想好好地补上这一课,回去以后就到文学所图书馆借了季本的《诗说解颐》等几种书,准备仔细阅读。不过天不从人愿,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我的读书计划并未能实现。再往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转而从事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当年的想法更无机付付诸行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1999年夏天,我有幸回北大参加刘毓庆先生博士论文的答辩会,读到了他的大作《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在拜读此文之后,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首先,有明一代的《诗经》学著作,至今留存的很多,其中有不少虽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中知道它的名字,但真正下功夫加以阅读的人就很少,像我本人就基本上未曾涉及。至于还有一些书,甚至为《四库》所未收,多少年来一直尘封于各地图书馆中,无人过问。这样卷帙繁多的典籍,一直没有人加以清理、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憾事。这次刘毓庆先生化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使我们明人在《诗经》学方面的成果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其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刘先生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对这些著作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将这些著作的性质及得失详加论析,把它们分出不同的流派。在这里,他把明代的《诗经》学史作了分期,指出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特色。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先生在本文中专设了《〈诗经〉考证学的兴起》,详论了杨慎、林兆珂、冯复京、吴雨、陈第等人的学术成就,这些著作我过去大多均未注意及之,读了刘先生此文,解决了我多年存在的疑问。文中还有专讲立异派《诗经》学的部分,更使我扩展了眼界。这些书,我过去虽闻其名,却一直未去细读,相反地往往对它们存有偏见。例如对丰坊其人,我一直认为他好伪托古人之名,颇有轻视之意,现在看来,这未免以偏概全,抹杀了他的可取之处。刘先生在本文中还专门论及明代《诗经》学研究中从文学角度来论诗的一些著作。在这方面谈得尤为仔细深入。关于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我过去更少注意,读了刘先生此文,不但增长了不少知识,也多少纠正了我过去对明代学术的偏见,所以读了刘先生此文,我深感获益匪浅,我相信其他读者一定也会有类

4 序

似的感受,尽管各人之所得未必相同。

现在,刘先生准备把他的大作出版,对此我当然竭力赞成。不过蒙他不弃,命我作序,我自惟谫陋,对《诗经》很少研究,恐难当此重任,勉强执笔,谬论想必很多,还望刘先生和广大读者教正。

曹道衡

2000年1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褚斌杰先生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藪。自汉迄清，它更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备受重视，从而注释、解说的论著，层出不穷，历世无绝。近年以来，学术界除用新观点对《诗经》一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外，还有人专注于《诗经》学史的研究和探讨，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总结历代《诗经》研究成果，有利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这还可以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和学术观点的特征，从而为更广阔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借鉴和旁证。刘毓庆君的这部《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正是这一学术史系统工程的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诗经》学研究中，明代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一是受旧日某些经学家的影响，多认为明学空疏、浅陋，而不足论，正是在此影响下，有关明人的《诗经》学论著，流传不广，已多罕见难寻。因此，研究明代《诗经》学，首先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和辨析工作。明人的《诗经》著作，由于久不被世人所重，故其著录多零而不完，存佚不明，需要重新搜索。刘毓庆君为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检索到 600 余种，远远超过前人所知所见，这不仅为这本明代《诗经》学术史著作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古籍目录学上的重要创获。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在《诗经》学史的研究中，对明代《诗经》

学的研究最为薄弱,可参考的研究成果很少,因此,刘毓庆君的明代《诗经》学研究,主要依靠他个人筚路蓝缕式的艰苦独立的研究,因此,其填补空缺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

刘毓庆君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对有明一代的《诗经》著作作了全面考察,并分时期,分学派,对现存的几十部明代《诗经》学代表作,作了细致、公允的评论,认为明代《诗经》学不仅在训诂、释义等方面曾作出特殊贡献,而且从明代中后期起,《诗经》研究开始由经学向文学转变,开创了《诗经》学发展的新方向。刘毓庆君的这些发掘和认识,纠正了前人对明代《诗经》学的错误认识和不公允评价,为科学地撰写中国《诗经》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毓庆君曾从师著名学者姚奠中先生治古典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先后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出版,在学术界颇具影响。1995年,刘毓庆君自山西赴北京大学求学,先为中文系高级访问学者,翌年,报考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我习先秦秦汉文学,此时,刘毓庆君已然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了。刘毓庆君于1999年毕业,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返回山西大学执教。诸君今日所见,正是刘毓庆君在北京大学期间所撰写之博士论文。

刘毓庆君正值盛年,在他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写了如上的话,既是对刘毓庆君过去成绩的赞赏,更是对他未来研究的期待。刘毓庆君好学敏求,学养丰厚,相信在将来,不断会有精彩的著作问世。

目 录

曹道衡先生序·····	1
褚斌杰先生序·····	5
自序·····	1

上编 《诗经》经学研究的持续与衰变

一、明代前期朱熹“《诗》学”的独尊与衰微·····	24
1. 明前“《诗经》学”的变迁·····	24
2. 明初文化环境与《诗经》研究·····	31
3. 朱子“诗学”诠释的延续·····	39
4. “诗经学”的理学化趋向·····	50
二、明中后期《诗经》“汉学”的复活·····	61
1. 复古思潮与《诗经》汉学的复活·····	61
2. 尊序抑朱派的《诗经》研究·····	71
3. 杂采汉宋派的《诗经》研究·····	84
4. 辨正汉说派的《诗经》研究·····	101
三、《诗经》考据学的兴起·····	120
1.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121
2. 《诗经》杂考派的研究·····	131
3. 《诗经》博物派的研究·····	145

2 目 录

4.《诗经》古音派的研究·····	161
四、立异派《诗经》学的高扬·····	175
1. 阳明“心学”与《诗经》研究·····	175
2. 季本与丰坊的《诗》学标新·····	187
3. 何楷的《诗》学贡献·····	201
4. 陈鸿谟之《诗》学立异·····	213

下编 《诗经》文学研究的崛起与繁荣

一、《诗经》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	230
1.《诗经》由“经”向“诗”回落的背景考察·····	230
2. 八股取士与《诗经》研究的转向·····	246
3. 诗文评点及诗话发展与《诗经》研究的转向·····	258
4. 从淳熙到嘉、隆·····	271
5. 徐常吉与《诗经》之文学研究·····	287
二、《诗经》文学研究高潮的兴起与名家的出现·····	299
1. 孙鑛的“格调”观与《批评诗经》·····	299
2. 徐光启的“诗在言外”说与《诗经六帖》·····	315
3. 戴君恩的“格法”说与《读风臆评》·····	334
4. 鍾惺的“诗活物”说与《诗经》评点·····	345
三、晚明《诗》学流派与《诗经》文学研究的繁荣·····	360
1. 讲意派的《诗经》研究·····	361
2. 评点派的《诗经》研究·····	377
3. 评析派的《诗经》研究·····	394
4. 汇辑派的《诗经》研究·····	411

5. 诗话派的《诗经》研究	426
附一明代《诗经》著述考目	440
附二主要参考书目	460
后记	466

自序

传统认为,中国“《诗经》学”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至于明代“《诗经》学”,则“无甚精义”,可以略而不论。从清以来,研究中国经学历史的学者,他们往往在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字的专著中,对有明一代的《诗经》研究成果,仅用数言、过百字或略过于此的篇幅一带而过,而且否定者多,肯定者少。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仅用“季本、郝敬多凭臆说”,“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行世而世莫能辨”二语¹,将有明一代的《诗经》研究否定得一干二净。胡朴安的《诗经学》一书,论及明代《诗》学,所举也只有《诗经大全》、《诗经解颐》、《读诗私记》、《诗经世本古义》、《诗故》等五部书。其结论是:“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最后用“此明代之《诗经》学也”一语概之²。谢无量的《诗经研究》,所举也仅《诗经大全》、《读诗私记》、《诗故》三书,而用“无甚精义”四字作结³。林叶连的《中国历代诗经学》,更举真伪不分的《诗传嫡冢》、《诗传闡》、姚允恭《传说合参》三著,以证“明朝学者无行之一斑”⁴。依此看来,“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

1 万有文库本第三册第292页。

2 万有文库本第100页。

3 河洛图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4 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

2 自序

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实在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了。

然而,当我们认真地面对这一课题时,才惊奇地发现,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年间,关于《诗经》研究的专著,竟多达六百余种!比今所知的自汉至元一千五百多年间《诗经》专著的总和还要多!《四库全书总目》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清代到民国的《诗经》专著,总计也不到五百种。由此也可知明代《诗》学研究的盛况了!嵇文甫先生曾有过如下的论述:

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了现实主义的曙光⁵。

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样,明代特别是晚明的《诗经》研究,你可以说它“杂”、“嚣张”,但决不能说它“庸”!

明代“《诗经》学”从纵向上可自然地分为两大块,一是经学的研究,一是文学的研究。自顾炎武以来,学术界对于明代《诗》学的否定,主要是站在经学研究的立场上立说的。是的,就经学研究而言,明人确实是杂了些,对圣人之义发挥得少了些,而其对于《诗经》文本的研究,实在有汉、唐、宋、清儒所不及之处。如丰坊《鲁诗世说》对《采芣》篇的研究云:

5 《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毛氏云：芣苢，车前，宜怀妊。考《本草》则曰：“车前子味甘，寒，无毒，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久服轻身耐老。”乃神农本经之语，初无怀妊之说。至《唐本草余》等，始云“强阴益精，令人有子”，盖因毛说而附会之也。滑伯仁：“车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则精寒而易痿；妇人多服，则破血而堕胎。岂宜子乎？”毛茛陋儒，必欲以“二南”为妇人之诗，故妄为凿说如此。且强阴益精，宥子所欲，而妇人采之，则淫妇耳，岂文王之世所宜有哉！

像这样彻底抛弃旧说而独辟蹊径的精彩之论，汉、唐、宋、清能得几人？今人每称许清儒姚际恒、崔述、方玉润三人，能独立于汉宋之争外，自辟门径。如胡适就曾称赞此三人“大胆地推翻汉、宋的腐旧的见解，研究《诗经》里面的字句和内容”，并以为这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标志⁶。但请看明人季本、丰坊、何楷、陈鸿谟等，哪个不是弃汉宋腐见、自辟新说的呢？

明代《诗经》经学的研究，被后儒略作肯定的明初百年间，基本上是衍义“朱传”，向理学的方向倾斜，没有什么新的创造。而恰恰是被清儒贬得一文不值的明中叶正德之后、特别是晚明，才开始形成了它自己的特色。而此期间所作出的贡献，置于汉唐宋清之列毫不逊色。

明人《诗经》经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考据训诂上，一是在诗旨的探讨上。考据学，清人确实作了大量的工作，成就卓著。但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建立在明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的。如对于古音的考证，首先是由明成化间的彭华，对宋代音学区

6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5 页。

4 自序

威吴才老提出了怀疑,认为古音与今音不同,赖经典韵语得以保存。随后杨慎又作了大量的考证,到焦澹园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韵说”的理论,陈第《毛诗古音考》用具体的事实考据,证实了这一理论,彻底推翻了此前占统治地位的“叶韵说”,为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开启了道路。清代训诂学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没有明代在古音学上的突破,是不可想象的。关于博物考据,像林兆珂《毛诗多识编》、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吴雨《毛诗鸟兽草木考》、沈万钊《诗经类考》、黄文焕《诗经考》、毛晋《毛诗陆疏广要》,以及林世陞《诗经人物考》、陈子龙《诗经人物备考》等,他们广征博引,兼考得失,在资料收集之功上,远逸前人,为清儒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诗义考据上,像何楷关于《大武》乐章的研究,这是一个前人鲜有问津的问题,而他继丰坊之后,提出了此乐章保存于《周颂》的观点,并作了考证,认为:《武》、《赉》、《桓》、《酌》、《般》、《时迈》六篇,即《大武》乐章的全部。可以说,这一研究是《诗经》学上的一个新突破。此后魏源、龚澄、王国维、高亨、孙作云等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究。诸家肯定了《武》、《酌》、《赉》、《般》、《桓》五篇为《大武》乐中的诗章,只是《时迈》与六篇的排列次序有分歧而已。他如杨升庵、焦澹园关于名物、文字训诂方面的考证,皆为后世所重。刘师培《国学发微》说:“近儒之学,多赖明人植其基⁷。”这确是不刊之论。

明人关于诗旨的探讨,是被后人完全忽略的一项成就。其实明人在这方面的成绩相当突出。像丰坊伪《诗传》、《诗说》,借申培、子贡之名,对许多诗篇作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说。如认为

7 《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2 页。